

黄元：中国须重新审视欧洲文明(上)

中国应当是一个敢于强大且善于富强、敢于创造且善于创新、敢于分享且善于共享的东方民族。

人类发展史已反复证明，任何强大的民族，都必然是充分自由的民族，国民能自由地思想、自由地创造、自由地奔走于全世界。中国应当是一个敢于强大且善于富强、敢于创造且善于创新、敢于分享且善于共享的东方民族。

乌克兰战争引发的对俄制裁立场及台海、印太秩序与安全等问题，使中国面临周边及国际发展环境骤然增多的矛盾关系。在所有矛盾关系中，都有一个共同主导者美国，但问题核心是中国应当如何去

构建与美欧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关系。

人类的发展进程已到了迫切时刻：中华文明应当如何与美欧文明相处，如何相与走向未来？这个问题，实际上在16、17世纪就已经很现实地摆出来，但一直没有得到理性的认识与正确处理。

欧洲文明相对于中国及全球有三个历史发展特性：欧洲曾在19世纪严重伤害中华文明，欧洲在15至19世纪间曾是全球文明的侵略者，也是人类近现代发展先驱。今天，重新认识欧洲，事关中国整体发展和全球秩序、安全及未来。中国主动了解西方的历史很悠久，战国时代典籍《穆天子传》已经有中

原与西域交往的历史记载。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后，随着一条经中亚、西亚抵达罗马的丝绸之路出现，中国对西方世界的认知增多，中国丝绸成为罗马帝国上流社会珍品。其时，西汉与罗马东西两大帝国交相辉映，是人类古代文明史上灿烂生辉的双子星座。唐朝时期，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大批西方商人来到中国，中西之间有了进一步互动。

近代欧洲文明的历史成就开创于文艺复兴，在此之前的欧洲核心文明主体，主要是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13世纪前，中国之于欧洲主要仍然只是一个传说。13世纪末，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从中国回国

后出版的《东方见闻录》中，对中国繁华的描述引起了西方的向往。

15世纪开始，欧洲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尤其是思想启蒙运动，在文学、数学、物理、建筑、哲学、法律及社会理想（包括空想社会主义）等诸多领域的知识与技术上获得大幅发展，出现大批建构近现代文明的高级人才。与此同时，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与地理知识增加，远航探索成为可能。经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库克等人的先后发现，欧洲人开始系统认识了全球地理结构，及人类存在与生活的具体分布，开始了足迹遍及全球的贸易与殖民掠夺活动，进而成为全球领导者。

欧洲并非天生野蛮，也非天生富裕高贵，欧洲文明的发展路径，系统地反映人类作为由生物性与社会性相内在统一的地球生物的发展法则。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的提出，基于人类生物原始秉性而建立能促进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制度要求；罗马法及其复兴、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洛克《政府论》、卢梭《社会契约论》及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基于人的社会特性而建立平等

公民主体社会的理性要求。正是欧洲社会在中世纪之后，基于人类生物秉性与社会属性的驱动，开始在政治、经济、法治与人文领域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彻底撕毁中世纪之前长期笼罩在欧洲上空，却违背人类自然秉性的神权学说，焕发生机，进而驱动全球发展。

马恩学说缺乏严密理论依据

中国对欧洲文明的重新认识至少应包括两方面：一、对欧洲文明整体品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位置的完整认识与把握；二、对自20世纪乃至现在深刻影响中国国家建制的马恩社会学说的理性认识与发展。

马恩学说无论是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而建立的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社会学说，还是认为公有制克服私有制的内在危机之后，建构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发展理论，都缺乏严密的人类生物学与社会学依据。整个理论学说，片面强调了人类的社会属性，而忽（无）视人类的生物性，且恰恰是由生物秉性决定社会属性这一人类根本特性。立足于生物秉性而处理好社会属性，应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根本性依循。马恩社会发展（



作者认为，中国对欧洲文明的重新认识至少应包括两方面：一、对欧洲文明整体品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位置的完整认识与把握；二、对自20世纪乃至现在深刻影响中国国家建制的马恩社会学说的理性认识与发展。（法新社）